

刘少奇来到淮河岸

王兆平

1939年秋冬 刘少奇肩负着开辟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重大使命，从延安来到淮河两岸。1942年春，当这一战略任务宣告完成时，他离开苏北返回延安。三年间，他的足迹走过了苏鲁豫皖四省，他把智慧和心血深深地注入了这片大地。

他的话胜似十万精兵

1939年秋，新四军第5支队挺进淮南路东，所属的3个团分别活动在盱眙、嘉山、来安、六合、天长等县，着手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但是，由于王明右倾路线的影响，政权还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手中，人民武装力量有些发展，但和当时形势的可能和需要相距很大，吃饭、穿衣都非常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刘少奇于同年11月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一到淮南，立即热情地向干部群众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消除错误路线的影响。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武装进攻和武装占领的方式来灭亡中国，逼迫中国政府、中国各党派及各阶层人士联合一致走上武装抗日的新阶段。”“在这种局势下，任何政党只有当他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并在国际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党当然也不例外。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号召所有的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毛泽东

同志的东进决心：“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止。”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针对当时有人批评“招兵买马”的议论，刘少奇说：“有马不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从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不科学的！”他提出，革命的兵要招，革命的马要买，必须积极地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刘少奇还谈了独立自主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问题，他形象地打比方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抗日民主政权。”“要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怕磨擦不行，要坚决反磨擦，不反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刘少奇的话语象春雨一样滋润着干部群众的心田，驱散了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乌云，从而使他们大为振奋。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的很短时间里，淮南地区的抗日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群众发动起来了，部队得到了充实和扩大。新四军第4第5支队由3000多人发展到万余人。第5支队比原有人数增加一倍多。活动于盱眙山区的10团，由原来的5个连400多人，扩编成10个连1800余人，还为盱、嘉两县各组建一个200余人的游击大队。原来极其困难的部队吃饭穿衣问题，随着群众的深入发动，反顽斗争的胜利也迎刃而解。

1940年3月，半塔保卫战胜利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淮南路东路西都建立了政权。路东成立八县联防办事处、八县联防司令部。同时委派了八县县委书记、县长和各区区委书记、区长。接着又开展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至此，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接着，刘少奇指示5支队向东开辟淮宝地区。5支队在罗炳辉司令员的指挥下，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放了蒋坝、高良涧、仁和、岔河、万集、新集以及金沟、黎城一带，把淮南根据地扩展到了洪泽湖西岸。所以，淮南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刘少奇的话胜似十万精兵。

亲临淮北送“法宝”

1940年5月1日下午，淮河北岸，人声欢腾。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战士正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候刘少奇的到来。自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以后，他便一直关心着皖东北的抗日斗争。是他在1939年5月提出由新四军游击支队派部队和干部东进泗县等地区开展工作。游击支队根据这个意见，不久即派中共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和刘玉柱来到皖东北地区，并派张太生率支队主力第1团和120名党政干部，随张爱萍赴津浦路东。是他在1940年2月亲自找中共苏皖区委书记金明谈话，明确形势，交待任务。他还写信给张爱萍、江华、刘瑞龙等人，提出苏皖地区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总的任务是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成为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皖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得到迅猛的发展，经过与日伪顽的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到1940年3月初步创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万事开头难，由于缺乏建设敌后根据地的经验，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很困难。恰在这时，刘少奇到了淮南，中共苏皖区委便满怀期望地派代表前往，请刘少奇亲自来淮北指导工作。

几只渡船飞快地驰向淮河北岸。刘少奇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岸，微笑着与苏皖边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张爱萍、刘瑞龙、金明等人握手，并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随后，他们来到了双沟镇附近的罗岗村。这是新四军6支队4总队司令部所在地。刘少奇非常体会大家的心情，一到住地就听汇报，研究问题。夜已经很深了，蜡烛换了一支又一支，刘少奇一边吸着香烟，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问着、记着。他对大家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同时，他总是说：“这是我的看法，你们情况比我清楚，请大家研究研究，看看行不行。”

在敌后动荡的环境下，能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容易的，谁都想见见刘少奇，聆听他的教诲。苏皖区党委决定第二天召开全区党政干部大会，请他作报告。谁知泗县、五河的日伪军，偏偏在这一天的拂晓突然对根据地发动“扫荡”。报告会只好停止，军民立即投入反“扫荡”的战斗。当刘少奇和中原局机关等转移到敌人的合击圈外，并打算继续向青阳镇东北的新行圩子、朱湖等转移时，张爱萍突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国民党顽固分子王光夏趁日寇对我进行“扫荡”之际，率 4 个团倾巢出动，从运河两岸向我背面进攻，已经占领了新行圩子、朱湖及其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立即向刘少奇报告这一突然的情况，请示对策。

刘少奇平静地对着地图研究着，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而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自卫了！正义是在我们这方面。”“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鼓舞士气，动员全军上下一致，以最大的努力，坚决勇敢地争取作战的胜利。”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第 6 支队第 4 总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终于从顽固分子的手里夺回朱湖和新行圩子以北大小 20 余个村庄。接着又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一部，组织了一次讨逆战役。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顽军王光夏 2000 多人，把这股勾结日寇的顽固分子赶回运河以东，完全收复并扩大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刘少奇在指挥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同时，总是把战士时刻挂在心上。他对部队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当他得知由于敌人“扫荡”，顽军进攻，筹集粮食十分困难，部队有几天每天只能吃两餐杂粮稀饭时，立即严肃地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仗呢？前方的部队是不可饿肚子的！”刘少

奇对部队的伤亡和政治情绪也极为关切，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要细心地询问这方面的情况。胡桥战斗胜利后，参战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有100多名战士伤亡。刘少奇得知后，立即把大队长胡炳云请来对他说：“你们这支部队是参加过三湾改编，长征路上常担任前卫的部队。许多老战士都身经百战，他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骨干，是无价之宝。多损失一个人，党和军队就少了一份革命力量。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也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1940年5月下旬，淮北大地上一片金黄，麦子收割的时节到了。刘少奇要离开淮北返回淮南了。临行前，他应大家的再三要求，在区党委召开的党政军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等方面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忽视自己独立力量的发展，不要丧失自己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独立性。发展力量就是抓武装、抓政权、抓发动群众、抓财政经济、抓发展党、抓培训干部。这是我们的“六大宝”。刘少奇虽然离开了淮北，但是，他给大家留下了“六大宝”，从此，干部群众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去。

坚持“化”下去

1941年7月底，新四军第4师第10旅从淮北转战到淮海区。华中局指示10旅要在淮海区安家落户，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

听到要实行地方化，许多同志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各种各样的议论都冒出来了，说什么“查查10旅的老家谱，从红军时代就是响当当的主力军，怎么要变成地方部队呢？”“为什么要变？还不是在路西几仗没打好！”“人家地方部队升级，咱们10旅降级了”等等。也有不少干部担心地说：“现在化整为零，哪年哪月再集零为整呢？”就在这个时候，10旅旅长刘震、旅政治部主任高农斧接到刘少奇同志从盐阜区发来的电报，要他们立即到华中局

去。看着电报，10旅的几位负责同志霎时心情为之一振，他们早就希望见到刘少奇同志，希望得到他的具体指示。刘震、高农斧当即出发，加鞭催马奔往华中局所在地。

警卫员把他们引进一所小草房里。刘少奇和陈毅正伏在桌上研究工作。看到刘震、高农斧，刘少奇、陈毅首先问他们在路西的作战情况、部队情绪，接着告诉他们：华北斗争已经进入了更加紧张、残酷的阶段，华中的局面也必将紧张起来。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带着征求意见的口气问：“你们有些什么想法？今后我们的棋应该怎么走？”刘震、高农斧不加思索地坚决地回答：

“坚决巩固与发展华中根据地，坚决与敌人斗争！”刘少奇同志频频点头说：“是这样，不管局势如何严重，我们都要坚持华中各根据地；在有利的条件下，要积极扩大部队，发展根据地。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迎接新的局面，10旅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淮海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你们怎么想？思想通不通？”

此时，刘震、高农斧的心情也十分矛盾。10旅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受到日伪顽三面夹击，艰苦奋斗了近半年，伤亡比较大。到淮海区，名为一个旅，实际上只有二个团四个营。部队疲惫，人员不足，要恢复部队的元气，需要安个家，有个地区作依托；但又担心变成地方部队，固定在一个地区，今后不能再机动作战。少奇同志似乎早已猜透了他们的矛盾心情，开导说：“你们不要犹豫，不要认为实行地方化是走回头路。这不是回头路，是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的正确道路。现在你们一个旅化下去，不要多久，就会有两个旅、三个旅、以至更多的旅成长起来。到那个时候，不仅人数多许多倍，战斗力也会比现在更强。”

时间已经到中午了，警卫员问是不是吃饭，刘少奇同志说不忙。他仍不知疲倦地谈下去，以红军、八路军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发展规律为例，反复说明10旅地方化是具体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

刘少奇同志的亲切教导，帮助刘震、高农斧纠正了原先对主力地方化的一些片面看法。刘少奇见他们一致表示思想通了，就又说：“通了就好。只是光你们通还不行，还要10旅的干部党员、以至每个战士都通。‘化’下去，就是到人民群众中生根；思想不通，根就扎不深。象种小麦一样，根不深，苗不壮，就难得丰收。”接着，刘少奇、陈毅又和他们商量的如何“化”下去的问题。

离开刘少奇同志的住处，已经是下午了。和风吹拂着，刘震和高农斧并马而行。此时此刻，他俩的心情格外舒畅，好似登上高山，看得更远了。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水西

何 静

溧阳水西村本是个远离县城的小村庄，既不靠名山，又没有古迹。可是，自从新四军将江南指挥部设在这里后，它的名气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从严治军

1939年11月7日，溧阳水西村的一块空旷的场地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大会正在举行。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全部到齐，战士们全副武装围坐四周，锃亮的钢枪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伴随着阵阵锣鼓声，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纷纷前来祝贺，还送来丰厚的慰问品。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操着宏亮的四川乡音说：“一支队有一支队开创的地区，二支队也有自己开辟的地方。江南的司令，特别多，他们也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可以把这些部队、这些地区统一指挥、统一管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部队、地方齐心协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的讲话，不时被阵阵掌声所打断。

当晚，举行军民联欢会，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整个水西村浸沉在欢乐之中。

江南指挥部成立后，陈毅和副指挥粟裕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制

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巩固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并为形成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为此，加强了从严治军和部队建设。

每天清晨，军号声划破宁静的水西村，司、政机关干部和警卫战士数百人就迅速集合到广场上。这时，一身戎装，神情严肃的粟裕已站在指挥台上了。粟裕搞军训的办法不少，除了军事操，还有基本动作的训练，典型战例的剖析，样样讲求过硬，绝不许打马虎眼，还亲自上军事操。

在实弹射击演习中，粟裕要求每个干部、战士在举枪瞄准时，把一枚铜板放在准星上，3分钟内不许掉下来，以此训练臂力、视力，提高射击的命中率。有一天，几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练了一阵子瞄准，自以为学到家了，就悄悄地闲聊起来。谁知粟裕已走到他们面前，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板，放在长枪的准星上，让一个新战士“击发”。随着扳机声，铜板掉在了地上。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让新战士在他的枪上放好铜板。几次击发，铜板竟纹丝不动。战士们敬佩极了！做完示范动作，粟裕站起身就走了。这种扎实的作风，严格的训练，给了全体指战员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粟裕的模范带动下，几个年轻的女战士也不甘示弱，实弹演习时个个争着上阵。其中速记员陈模3发子弹中了20多环，陈毅十分高兴，亲自为她们摄影留念。

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得指战员们个个英勇善战，弹无虚发，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安中里之战

1940年2月21日，侦察员从青龙山送来急件：800多日寇已从天王寺朝上兴方向开拔。陈毅深感日寇进攻水西村的可能性极大，便立刻召开司、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

深夜，一名汉奸带着几个日寇偷偷来到安中里附近的庙前西

桥。新四军哨兵发现异常情况，立刻吆喝盘问，不料被日寇刺死。当鬼子要通过新四军第二道岗哨时，机警的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枪声，惊醒了沉睡的村庄，正在安中里守卫的指战员立刻集合，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坐镇在水西村的陈毅，听到安中里传来的枪声，就觉察意料中的战事发生了。他迅速下达了紧急集合令，200多名指战员火速汇集到广场上。

陈毅的神情威严，宏亮的声音在夜色中回荡：“同志们，我们要不要保卫水西村？”

“要！”

“要保卫水西村，就要坚决杀敌。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

陈毅随即作出部署：主力部队迅速投入战斗，警卫班守住村前大桥；机关干部、当地群众立刻向神塘圩、余桥村方向转移。同时部署侦察班火速通知教导大队，抄日寇的后路，狠狠地打。

一声令下，部队、机关火速行动起来了。

只见陈毅跨上骏马，提着马枪，威风凛凛地在村前来回巡视。子弹“飕飕飕”地从他的头顶飞过，他丝毫不予理睬，举起马枪，连连反击。粟裕一溜小跑到村前的小桥边，对守卫在那里的警卫班长明确交待：“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撤退！”

翌日早晨，一群日寇向水西村扑来。陈毅立刻与粟裕商量，派人将村前的小桥拆去，斩断日寇的来路。

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和一位当地的乡亲，拿着钉耙、铁锹等工具，匍匐来到河边，撬掉了桥面。

日寇见状，拼命向木桥冲杀过来。守卫在桥边的警卫战士手中的机枪、步枪顿时响了起来，以密集的火力将通往木桥的路口紧紧封住，不让日寇越雷池一步。

这时，安中里又响起了震天枪声，这是教导大队在奉命袭击日寇的后路。冲向水西村的日寇怕断了归路，乱了阵势，惊慌得

四处逃窜；有的拖着同伙的尸体落荒而去。下午二三点钟，丧魂落魄的日寇全都逃回了据点。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水西村的美梦被新四军的铁拳砸得粉碎。这次战斗，新四军创造了以少胜多，保护指挥机关的战例。

当晚，暂时撤离的干部、群众又陆续回到了水西村，举行了军民联欢会。这天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水西保卫战的胜利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

让冷欣“热”起来

当时，国民党第 2 游击区总部、63 师师部、江南行署设于水西村东南 30 公里外的戴埠、山丫桥一带。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还保持着较好的友军关系。陈毅等人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地减少相互间的摩擦。他曾经幽默地对政治部的同志说，冷欣（心）岂能抗日，我们要争取让他的心热起来。

1940 年 4 月的一天，陈毅接到国民党第 2 游击区机要室主任秘书兼江南行署秘书处处长巫兰溪的来电，说明日上午要来水西村拜访。对他的来访，陈毅、粟裕作了妥善安排。谁知第二天一早，突然发生军情，待陈毅、粟裕处理完毕回到水西村时，巫兰溪已在指挥部等候了。

陈毅、粟裕一进门，就带着歉意迎上去与巫兰溪握手：“让你久等了，实在对不起！原来我们准备在五里外欢迎你的，不想前线有情况，不得不作应战准备。现在，日本兵已溃退了，咱们可以安心谈谈了。”

巫兰溪说：“冷欣总指挥曾对我说，陈毅可算是当代的英雄，他的历史，他的才智，他的战功，都不在叶挺、项英之下。只要他的态度积极一些，到我们这里来，当个军长也不成问题。”

陈毅听罢，哈哈一笑说：“在赣南三年中，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富贵名利皆浮云也，何足挂齿！我有生之年，只想为祖

国、为人民贡献一份力量，还谈什么升官发财： ”

巫兰溪听了，心中对陈毅的豁达胸怀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两人深谈下去，倒也投机。情趣所至，陈毅意气风发，挥毫泼墨，作诗《为苏南摩擦答某君》相赠：

江南抗战地 / 谁为万夫雄 / 游击三肱折 /
摩擦一丘同 / 继光能拒敌 / 秦桧自和戎 /
投降缘底事 / 敌伪已图穷 / 强梁海上来 /
三年战局开 / 怒潮翻海岳 / 雄鬼起风埃 /
反共仇所快 / 民主敌难摧 / 唯君知我意 /
慷慨有馀悲。

巫兰溪水西之行，原本是奉命为冷欣亲自来江南指挥部打“前站”的。想不到巫兰溪返回江南行署后，把新四军如何英勇善战，陈毅如何文武双全，大大夸赞一番，冷欣等人听了心里酸溜溜的。5月的一天，第2游击区总指挥、63师师长、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在全副武装的警卫和一大批随员的簇拥下，来到水西村。陈毅把他迎到指挥部稍事休息后，请他到附近的关帝庙内向司、政机关人员“训话”。接着，由战地服务团演出了文艺节目。精彩的表演使冷欣一行大开眼界，真想不到新四军的文艺人才这么多。然后陈又邀他到村上“巡视”一番。冷欣所到之处，只见指战员纪律严明，军容威武，装备整齐，村边、路旁、河畔、树林中，随处可见将士们在龙腾虎跃地练武。

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冷欣这下对新四军的军政训练有了深刻认识。临行前，他向陈毅提出，邀请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去演出。陈毅当即爽快地答应下来。

（中共溧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谭震林闯关到东路

席学明

很多人都知道谭震林同志的绰号叫“谭老板”，可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据说，它与谭震林的一段惊险经历相联系着。

1940年，阳春三月，皖南山区一片春光明媚的景象。在崎岖的山道上，几匹快马在奔驰。骑在最前面马背上的是一位瘦削的中年人，他叫谭震林，是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如今他奉命赶到新四军军部，接受新的任务。

项英副军长把他迎进屋里后，便开门见山地向他宣布，根据陈毅同志多次要求，军部决定派他到苏南东路地区去组织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主持东路地区的抗战工作。军部不给兵、不给枪、也不给钱，只给少数干部作骨干，尽快把东路地区开辟成抗日游击根据地。

听了项副军长的话，谭震林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反而觉得很痛快。因为，虽然他参与指挥了五保繁昌的大血战，大灭日军的威风，大长新四军的志气，但是，他总感到这好象是在为别人看守大门。俗话说，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这下子，他可以到敌后地区去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军部决定。3月下旬，谭震林与廖海涛、俞炳辉、白书章，以及由樊道余带领的新四军教导总队的30多名学员一道，踏上了东进的征途。

谭震林知道，对于他们十分陌生的东路地区，将是一个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和艰苦的地方，必须让每一个同志及早做好思想准

备。为此，临时党支部成立了。每天晚上，支部都组织大家学习。谭震林则给大家讲革命传统，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讲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从皖南到茅山，行军走了18天，一共学习了16次。在茅山地区，他们见到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自从接受新任务以后，在谭震林头脑中考虑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顺利通过长达数百里的敌占区，安全抵达目的地。武装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根本不可能。利用晚上进行穿插？数百里之遥，又谈何容易。我们何不乔装打扮，堂而皇之地坐火车到东路地区去呢！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告诉他，越是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往往敌人越放松封锁，我们越是有隙可乘。他把这个大胆的设想对随行的同志一讲，立即得到他们的一致赞成。最后决定，谭震林、张开荆、刘飞、戴克林、樊道余、白书章等6人，分别化装成经商的老板和随行的伙计，设法搞到身份证，从常州坐火车直达东路。其余的同志随后设法前往。

谭震林一行告别了陈毅和袁国平等，离开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来到中共丹阳中心县委驻地延陵镇。中心县委书记陈洪端上清香扑鼻的茅山新茶招待大家。陈洪告诉他们，近来日军封锁很严。铁路两旁架起了铁丝网，铁路上日军的铁甲车来回巡逻，大运河里的船只都被扣留在日军据点里。他向谭震林建议，用“合法”路线去东路。真是不谋而合啊！谭震林他们不由会心地笑了。这时，随同而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需部长吴师孟在一旁开了腔：“谭司令，你们先休息吧，我走了。”

谭震林道：“好的，一路上小心哪！”

陈洪奇怪地问道：“唉！老吴，你到哪里去呀？”

还是谭震林为他解开了疑窦。原来，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时，曾要军部派人去常州寻找并护送张太雷烈士的遗属去延安。另外，要在常州物色可靠对象，建立交通站。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部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吴师孟。他只身潜

入常州，找到张太雷烈士的夫人及儿子张一阳。离常前夕，张一阳将自己的好友、萃昌豆行店员张建林介绍给吴师孟。张的妹妹已参加新四军，并在皖南军部工作。张本人也怀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托付重任的热血青年。此后，张建林为新四军采购和转运了多批军需物资。经半年多时间的考察和培养，同年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常州交通站成立，张建林任站长，并先后在豆行员工内部发展了几位成员。可是，这次护送任务却非同寻常。因此，吴师孟决定亲自前往部署。

当身穿长衫，头戴铜盆帽，一身商人打扮的吴师孟信步踏入萃昌豆行时，张建林知道一定有重要任务来了。他将吴师孟引上阁楼，便急忙询问来意。吴师孟对他说，最近几天内，有一位司令要带几个人过常州。这里作为落脚点，要保证来人的绝对安全，并顺利护送他通过常州。张建林郑重地接受了任务。

谭震林一行在延陵住了七、八天。他们脱下军装，里里外外换上了合身的衣服，然后照了相，准备到常州办理通行证。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谭震林等人由吴师孟陪同，坐船来到常州。每个人都作了精心化装。谭震林身穿雪白的衬衫，外罩哗叽长衫，毛料背带西裤，脚蹬锃亮的皮鞋，头戴一顶考究的礼帽。无论怎么看，谁敢怀疑他不是一个大买卖的老板呢？其他几个人则分别打扮成伙计一类角色。此时的谭震林不仅有了延陵镇绸布店老板的新身份，而且有了新的名字——李明。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到东路地区以后，大家都习惯地称呼他为“谭老板”。

早春的夜晚，春寒料峭。离敌占区越来越近了。寂静的夜空偶尔传来凄厉的狗吠声。再往前，就是一个敌据点。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在平时，拔掉一个小小的据点还不易如反掌？可现在，重任在肩，“李老板”要大家再仔细检查一遍，有没有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东西。果然，在一个同志的皮夹里还留有几张新四军的批条。要是真碰到敌人检查，那后果真不堪设想！他急

忙把它撕碎扔进河里。

在夜幕掩护下，“李老板”一行顺利闯过几道关卡。第二天早晨，到达常州西门外。铁蹄蹂躏下的常州城，一片恐怖气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街头巡逻，铁丝网把交通道口扎得严严实实，老百姓排着队在检问所门口等候检查。“李老板”一行强忍怒火，在吴师孟引导下走进萃昌豆行。张建林热情地将“客人”迎进室内。住处早已收拾干净。“李老板”住一个单间，其他人安排在客厅。

一切安顿下来后，当务之急是搞到通行证。吴师孟把“李老板”等人的照片交给张建林，要他设法及早办妥。交通站建立后，张建林已建立了一些可靠的社会关系。其中有一位姓顾的青年，在日军机关里负责打印通行证，请他办理通行证是最合适不过了。为了稳妥起见，张建林请他打麻将，吃馆子，还送了礼。待有了十分把握后，才提出要求。姓顾的青年一口便答应了。

4月20日，张建林买好去苏州的火车票后，陪同“李老板”一行分乘黄包车来到常州火车站。他们穿过一道道岗哨，进站时，不卑不亢地递上“良民证”，日本兵见到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板，旁边簇拥着他的几位伙计，而且又没有什么行李，便向他们打了个手势，表示通过检查，准予放行。“李老板”一行从容走向月台。已先行进站的张建林、吴师孟这才舒了口气。

火车在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上奔驰，傍晚时分抵达苏州。日伪统治下的苏州城，满目凄凉之感，昏暗的街灯照着高低不平的石头路，店家早已关门打烊，行人稀少，倒有不少密探象幽灵一样在游荡。素有“天堂”美誉的姑苏城已变成了一座地狱。吴师孟、张建林和“李老板”等人分乘黄包车直奔阊门外石路闹市区的东来旅馆。

因为时间尚早，他们特意到外面饭店舒服地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又去附近的电影院连续看了三场电影，直到了半夜时分，汉奸查房的时间早已过去后，他们这才回到旅馆休息。

第二天拂晓，“李老板”一行顺利通过敌人的检查，登上去常熟的小轮船。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清晨的空气格外新鲜，“李老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啊！一个多月的旅途生活就要结束了，他怎不由衷地高兴呢！然而，新的战斗即将开始，他的脑海中又在酝酿着新的问题……

不久，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在常熟徐市成立了。在谭震林的领导下，中共东路特委制定了《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掀起了发动组织群众的“红五月运动”。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了，对原有的部队实行统一整编，并确定了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的发展方针。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斗，一个崭新的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江南日伪的心脏地带建立起来了。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委）